

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

心路

透视共和国同龄人

◎ 米鹤都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

米鹤都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 / 米鹤都著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8

ISBN 978 - 7 - 5073 - 3344 - 2

I. ①心… II. ①米… III. ①社会生活—概况—中国—1949～ IV. ①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6247 号

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

著 者 / 米鹤都

责任编辑 / 马云飞 吴少京

封面设计 / 刘 德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网 址 / www.zywxpress.com

邮 编 / 100017

销售热线 / 010 - 66513569 63097018 66183303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北京华艺图文设计制作公司

印 刷 /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680 × 960 16 开 26 印张 430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0001 — 5000 册

ISBN 978 - 7 - 5073 - 3344 - 2 定价：49.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　言

本书所着眼的一代人，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同龄人。在中国现代社会中，没有哪一代人比他们更具传奇色彩、更加难以把握和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了。

这个社会群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诞生到这个世界。他们是共和国最早的小主人，出生在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之下。一个甲子的光阴，他们与国家荣辱与共，共同承受了众多的荣耀和磨难。他们的代表性经历在中外历史上几乎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换句话说，他们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所大学中的实验班。

这代人作为“祖国的花朵”，有着金色的童年，“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宁愿把牢底坐穿”的第一代革命者，给予了他们生活上的温暖和人之初的教育。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听毛主席的话，把自己与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代人进入少年之后，社会开始以是非曲直的形式向他们灌输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尽管在长身体的时候饿着肚子，但并不妨碍他们心中以刘文学、张高谦的形象取代了卓娅和舒拉，一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取代了“我们新中国的儿童”的少先队队歌……

可以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以全新的思想意识刻意培养的一代人，从刚懂事的时候就被灌输了与其年龄不相称的阶级斗争理论。未容他们成年，就被当成了“革命小将”，而以红卫兵的不良形象充当了“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无论海内海外，无论是历史论著还是文艺作品，红卫兵几乎成为了“文革”的罪恶之源。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在成年人执掌的社会中，却由当年这些未成年或者刚刚成年的孩子承当了“文革”的形象代言人，很多罪恶也悄然写在了“红卫兵”三个字之后。

当红卫兵们在成年人的深层政治斗争中失去了利用价值后，一声号令之下就整体被送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初始，他们仍然以真挚的热情，挺着尚未发育成熟的胸脯，奔赴到祖国的各个角落。时过未久，严酷的社会实践，使他们发现自己在承当着又一场社会实验的载

体，名义上是改天换地的“知识青年”，实则成为“接受再教育”和改造的对象，不被见容于社会的主流。

自幼造就的以强烈责任感为表象的理想主义性格，迫其在逆境中思索，并逐步完成了社会化过程中的脱胎换骨。在成长和成熟过程中，他们没有改变的，依然是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执着。与祖国的命运同喜、同忧，为社会的未来而思、而搏，这几乎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历史性格。“四五运动”中，他们又一次充当了先锋。

实践让他们重新唤起了怀疑的精神，不仅审视自身，经历了自我否定的痛苦过程，也扬弃了被传统称为“信仰”的东西。“代沟”这个外来名词在中国的最早出现，也就成为他们而立之年重返社会的伴随物。他们为信念驱使如饥似渴地补充着知识，体味着形形色色的思潮流派，并探索着“中国向何处去”这种似乎不该由他们考虑的重大问题。他们终究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这是“文革”中最早觉醒的一代，也是反思最为深刻的一代，从而也成为改革事业中最坚定的一代。

伴随大面积的返城，他们成为共和国最早的庞大失业群体，被称为待业青年。他们没有等待社会的救济和安排，在很短时间内，千万计的返城待业青年便把这个社会巨大的包袱自我消化殆尽。并以此为开端，触发了城市中的经济体制改革，个体工商业和民营企业应运而生。他们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他们带给这个社会的不是负担，而是社会发展的新希望。

重新融入社会之后，他们在新时期暴露出在文化水平和知识结构上的严重缺陷。为谋求生存也好、不安分守己也罢，他们一边忙于养老哺幼，一边忙于补习知识。通过科班的大学也好，通过自学的途径也好，但不容置疑的是，其多数跟上了时代的脚步。即使是从拖家带口地做学徒工、临时工重新起步，他们脚踏实地的打拼也终于赢得了社会的承认。

他们好不容易站稳脚跟，刚刚开始享受通过努力创造出的“张大民式的幸福生活”，就面临着整体下岗的命运。新一轮的深化改革和利益再分配，使他们中沉默的大多数再次成为了失业大军的主体，不过这次的名称则由“待业”变成了“下岗”。“待业”也许还意味着有可待之日，“下岗”却昭示着已无岗可上。当共和国三十而立，他们还未能立足；当共和国四十不惑，却让他们惑上加惑；当共和国五十而知天命，他们中的多数却再次要为生存搏命；共和国六十耳顺之时，这代人

则被社会彻底地边缘化；今天，共和国已雄赳赳地走向“从心所欲”，他们的经历却成为了被社会失忆的片断。许多人仍然在为早年的理想所困惑，为晚年缺乏保障的生计而忧虑。

当然，这代人也并不乏种种辉煌，甚至至今一些代表人物仍旧在很多领域独领风骚。但是这些成功光环的背后，是以绝大多数同代人为巨大分母而实现的。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分母之大远远超过上下两代人。无论如何，他们是注定要为共和国做出牺牲的一代。古人曰：“五十而知四十九非”，亦有“六十而知五十九非”之说。当“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已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今天，回过头来，这代人有太多的倾诉。尽管如此，在社会上充斥着上一代今不如昔的抱怨和啃老族矫揉造作的呻吟，他们保持了宽容和沉默。在这点上，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是伟大的，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成为中国改革的铺路石，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的桥梁。

对于这一代人，有人把他们称为“红卫兵一代”；有人把他们称为“老三届一代”；还有人把他们称之为“知青一代”。可以说对于他们的称谓和概念使用上，十分混乱，即使在学术界从外延的划分到内涵的理解也都存有很大歧义。这里，希望首先通过对一些概念进行定义，确定本书阐述中的概念内涵，同时求教于学术界。

“红卫兵一代”作为一种名称和划分代际关系的提法，源于李泽厚先生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他在划分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时，首先使用了“红卫兵一代”的概念，同时划分了新中国建立后的几代人。据此，笔者略作改动，将李泽厚单独列出的“三八式”一代人与“五四”后的毛泽东一代合并，统称为共和国的第一代。另外，这里把与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同龄人称为第三代人，介于二者之间的称为第二代人。

在李泽厚之后，红卫兵作为“代”划分的特征和符号，开始被海内外学术界广泛接受。这种称谓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突出了这代人第一个特征性的“代”的经历——红卫兵运动。由于红卫兵的名声在国际国内都带有相对的负面含义，以及这代人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参加过什么红卫兵甚至是其受害者，因此他们根本不承认自己是什么“红卫兵一代”，更不同意以红卫兵作为这代人的“代”符号。尽管人的经历是无法抹杀的，不过，以它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概念不能不说有很大的缺陷。

有人用“老三届一代”作为这代人的统称。“老三届”的狭义概念是指“文革”期间应于1966、1967和1968年毕业的中学生。但是，今天我们谈到“老三届”，很多时候也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符号，来概括一代人，来揭示一个时代的风貌。但是这个名称毕竟有些特定，因而显得狭隘。

还有人使用“知青一代”作为另一同义词。“知青一代”强调了这一代人普遍的社会经历，它突出的是这代人第二个特征性的“代”的经历——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虽然是这代人的主要社会经历，但是这代人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所以概括一代人也略有牵强。

有鉴于上述不足，本书使用“第三代”作为这一代人的称谓或符号。作为“代”划分的特征和符号，“第三代”没有什么政治色彩，比较中性，同代人比较易于接受；而且其范围比较宽泛，不完全依据某一经历。使用这个符号的另一个依据是，我们的下一代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已经自称为“第四代人”了。

那么，“第三代”的概念涵括什么？

笔者在《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和《聚焦红卫兵》（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两书中，尽管使用的是“红卫兵一代”的称谓，也曾使用过“老三届一代”的称谓，但是作为“代”的定义始终是一致的。即：这一代人是以“老三届”为主体的，上面包括“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下面包括至“文革”结束还在上山下乡的各届中学生。宽泛地说，这代人涵盖了整个六十年代正在读书年龄的所有人。这一划分标准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同代人的认可。

社会学上对“代”的划分，并不完全按照年龄上的因素，而着重于“代”的特征，即：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具有共同社会经历、共同思想体验、共同行为特征和共同历史性格的社会群体。而“第三代”，恰恰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他们作为一代人的“代”特征。

“代”是历史纵向的划分。从社会横向来看，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结构和户籍制度造成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化，如果按照上述划分“代”的依据，虽年龄相仿但是不享受吃国家供应粮的这部分农民群体，实质上没有包含在我们所说的“红卫兵”、“老三届”、“知青”的概念中。因此，使用“第三代”这样一个最宽泛的概念，虽然可以涵盖生活在

那个历史阶段的整个一代人，但是，本书记载的主要还是当年生活在城镇的“第三代”，虽然这本身是一种不公正，但历史事实却是无法改变的。

第三代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它也极具特点。

如果把第三代这个群体放到同时代的国际社会中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整体经历不仅绝无仅有，而且具有不可复制性。他们是在国际社会向工业化、都市化的发展进程中，参与了一场反历史进化方向的社会大迁徙。他们堪称是当代社会的活化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如果把第三代这个群体放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观察，则明显感受到他们的整体命运始终伴随中国现代政治而跌宕起伏。几乎每次社会大动荡，他们都成为了主要载体，或者说是主要的牺牲品，凸显出他们在共和国历史中的实验班角色。

今天我们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困难在于尚未与历史拉开足够的距离，因此难于做到不带情感色彩的超脱，从而也就难于完全客观。这个命题是当今研究者们无法逾越的，还有待于历史的沉淀和升华。沉淀下去浓烈的情感，才能升起来超脱的理性。

另外，对这样一代人做出一个合乎实际的理性评判，既需要大思想家的哲人睿智，也需要大历史家的春秋之笔。本书仅仅希望以粗浅的尝试，通过对一代人所作所为、所想所感的观察，从一些特定的或者说有一定代表性的侧面，记录和分析这代人的生活、教育、思想、经历等方面素材，来勾画和描述第三代人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六十年过程中的心路历程。还要重复那句老话：

把真实留给历史！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第一章 黄色的土地 | (1) |
| 第一节 沉重的传承 | (2) |
| 青春的烙印 | |
| 我们认识的共产主义 | |
| 大一统和形而上 | |
| 革命的“大跃进” | |
| 阶级斗争学说 | |
| 第二节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 (19) |
| 新的时代 | |
| 革命需要迷信 | |
| 斯大林身后事 | |
| 第三节 不解之缘 | (27) |
| 文明传承的前喻 | |
| 上乘的孝道 | |
| 大树下的两代人 | |
| 父子嫡传 | |
| 权威人格和赏罚导向 | |
| 第二章 革命的洗礼 | (41) |
| 第一节 连绵的运动 | (42) |
|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 |
| 精神与运动 | |
| 牢记阶级苦 | |
| 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 |
| “革命化运动” | |
| 第二节 虚幻的使命感 | (54) |
| 我们胸怀全球 | |
| 接班人五条 | |

| | |
|---------------------|---------|
| 职业革命者的取向 | |
| 纲举目张 | |
| 第三节 天生我才 | (67) |
| 探索教育革命 | |
| 天生的优越感 | |
| 不同的压抑感 | |
| “四、六、八”学潮 | |
| 第四节 狂飙突起 | (85) |
| 初夏风波 | |
| “金猴”出世 | |
| 概念的界定 | |
| 保卫毛主席 | |
| 蜂起的红卫兵与工作组 | |
| 造反有理 | |
| 不同的境遇 | |
| 第三章 混沌年代 | (111) |
| 第一节 “对联”与血统论 | (112) |
| “红五类”和“黑五类” | |
| 狂热的声浪 | |
| 谭力夫讲话 | |
| 微弱的不同声音 | |
| 血统论、等级制及种姓制 | |
| 对联的实质 | |
| 隐性的利益博弈 | |
| 第二节 “八一八”和红八月 | (138) |
| 何谓“八一八” | |
| 被颠倒的师生 | |
| “破四旧”宣言 | |
| 抄家风潮 | |
| 查封民主党派 | |
| 第三节 源起初探 | (156) |
| 两种英雄观 | |
| 两种归属感 | |
| 信息的不对称 | |
| 教育的悖论 | |

| | |
|------------------------|--------------|
| Teenage | |
| 第四节 红卫兵纠察队 | (170) |
| “西纠”的成立 | |
| “西纠”的作为 | |
| “十三道金牌” | |
| 衰落和解体 | |
| 关于“西纠”的组织 | |
| 关于“西纠”与遣返 | |
| 第五节 谁之过 | (203) |
| 谁在推波助澜 | |
| 乱上加乱的经济动因 | |
| 残暴的因果 | |
| 冷漠的多数 | |
| 就暴力谈忏悔 | |
| 第四章 分野和流派 | (223) |
| 第一节 红卫兵“老”了 | (224) |
| 十三期社论 | |
| 三个“原则问题” | |
| 强烈的失落感 | |
| “联动”思潮 | |
| 破私立公大会 | |
| 不同的声音 | |
| 伪“联动” | |
| 失败的抗争 | |
| 第二节 四四派 | (250) |
| 另立门户 | |
|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 军训和复课闹革命 | |
| 酝酿权力机构 | |
| 中学红代会的诞生 | |
| 第三节 四三派 | (265) |
| 自己解放自己 | |
| 《出身论》 | |
| “四三”风波 | |
| “四四”余潮 | |

| | |
|--------------------|--------------|
| “四三新思潮” | |
| “四三派”的主要活动 | |
| 第四节 小议红卫兵三派 | (284) |
| “四三”与“四四” | |
| 就事论事 | |
| 细化差别 | |
| 第五章 共同的归宿 | (293) |
| 第一节 上山下乡的缘起 | (294) |
| 和工农相结合 | |
| 失业威胁抑或反修壮举 | |
| 青年≠接班人 | |
| 美丽的憧憬 | |
| 告别城市 | |
| 第二节 磨难 | (309) |
| 一位兵团战士——难以忘怀的黑土地 | |
| 一位延安老插——那曾属于我的黄土地 | |
| 一位兵团战士——长眠于冻土下的知青 | |
| 一位军垦战士——近乎原始的红土地 | |
| 一位内蒙老插——并非浪漫的绿草原 | |
| 政策的调整 | |
| 第三节 憬悟 | (328) |
| 变幻的阶级斗争对象 | |
| 现实中的“阶级敌人” | |
| “九·一三”的震撼 | |
| 吃饱肚子才是硬道理 | |
| 整合与回归 | |
| 第四节 返城 | (346) |
| “理想”的幻灭 | |
| 逆境与自强 | |
| 返城风的刮起 | |
| 政策导致的“战争” | |
| 旁门左道的病退 | |
| 多余的人 | |
| 第五节 殊途同归 | (366) |
| 位卑未敢忘忧国 | |

| | |
|--------------------|-------|
| 以改革为归宿 | |
| 幸运儿们 | |
| 难以评估的评估 | |
| 青春无悔 | |
| 知青情结 | |
| 结语 我看“第三代人” | (389) |
| 难以被人原谅的红卫兵运动 | |
| 背井离乡的上山下乡之旅 | |
| 改革开放的大浪淘沙 | |
| 思想体验：整体的否定之否定 | |
| 行为特征：磨难后的求实和坚毅 | |
| 历史性格：怀疑和追求的精神 | |
| 历史的错位和缺失 | |
| 后“文革”社会的代际 | |
| 结语：分野、共性和挑战 | |

第一章 黄色的土地

每一代人的成长，都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要真正了解与共和国同龄的“第三代”，就要了解他们成长期的气候和土壤。正是这些条件，历史地选择了哪些种子能够发芽，并影响到它们的开花和结果。

从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那一刻，到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动乱，其间经历了十七个跌宕起伏的春秋。这段时期，既有值得民族骄傲的成就，也有不堪回首的灾难。在这一历史环境中，第三代人出生成长。老一代的理想主义决定了第三代人的精神面貌，和平环境又使他们成为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小主人”而备受青睐。

这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渡时期。其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东方传统文化的碰撞、交汇和融合。这一文化场景，使第三代人受到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影响。他们被灌输了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也同时为传统的文化所孕育。在他们的突出特征——理想主义的人格上，也渗透着中西合璧的痕迹，既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宏愿，也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十七年的风风雨雨，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讲清。通过透视那片为这代人定下人生基调的历史和文化的土壤，可以浅尝辄止地了解到他们理想主义的由来。

第一节 沉重的传承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青春的烙印

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尽管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动乱，饱受欺骗和愚弄，以致把青春自愿地奉上个人崇拜的祭坛。但是，今天他们回顾曾走过的道路时，依然对那个年代怀有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感情。使人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当年的社会氛围以及自我的一丝留恋，感受到那一时代的某些精神和风尚在他们血脉中的延续。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烙印。

十年动乱给予这代人东西太多了，但最明显的是彻底改变了他们60年代的成长模式。这代人思想的成熟，性格的形成，则是通过对十七年所受教育的扬弃，通过广阔天地的磨砺，通过改革潮流的涤荡而实现的。历史地看，他们从来就不是安分守己的一代，其主导意识或许还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也许就是无法扼止的时代进步。

一般意义上，一代人的历史性格，是在青春时形成，而立之年成熟并稳定。而在社会的转型时期，由于社会本身的动荡而造成向后的推移。因此，今天还难以对第三代人的历史性格下一个完整精确的定义，只能通过探索他们思想发展的轨迹，即“心路”历程，来展示这代人在60年代至70年代形成的某些品格。

最难于在岁月中磨灭的，也必定是对人们心灵影响最深的。青春留给这代人的，最主要也是最具特征的，或许就是积淀在他们心灵深处的那种理想主义人格和对社会的责任感。80年代，一位学者曾写下这样几句话加以概括：

“我们是一些残存的，
然而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

二十多年前的这段话，又经历了几番大潮的涤荡，或许可以修改成为：“我们是一些残存的，然而却是不死的，已经失去了‘理想’的理想主义者”。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这代人今天带有典型性的心态，说它恰当也只能是相对的。不过，用它来把握这代人在“文革”十年所走过的道路，却是妥帖的。当年，理想主义的热血，使这一代青年戴上红袖章，走上阶级斗争的第一线；使他们打起背包，奔赴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广阔天地；痛定思痛之后，使他们恋恋不舍的依然是当年那种勇敢地追求真理、以天下为己任、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

历史就是这样的奇妙，不管是戴着红领巾在街上学雷锋、做好事的可爱孩子们，还是佩戴着红袖章、挥舞着武装带在街上破四旧的粗野青少年；无论是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企图大有作为的幼稚行为，还是这代青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做出的英雄壮举，这些似乎使人完全不可能产生联想的对象之间，这些表面上几乎找不到任何因果关系的事物之间，只有熟悉这段历史并具有洞察力的人，才能从扑朔迷离的现象中，看到那条无形的纽带——理想主义的人格。甚至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所干的好事和坏事，臧否毁誉的背后，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难怪下一代不无嘲讽地说：“你们已经走不出那个理想主义的怪圈了。”

对于理想主义，历来有贬义和褒义两种使用概念。有人说：“理想主义者就是倒着看历史时间表的人。”有人说：“所谓理想主义者，就是发现玫瑰比包心菜香，就贸然推论用玫瑰来做汤一定比用包心菜来做汤好吃的人。”有人说：“理想主义就是鼓吹超越现实的乌托邦，就是人们头脑中幻想的理性化。”站在特定的角度，每种说法都有它一定的道理。即使均作为褒义使用，有时各自的含义仍会有所不同。笔者在本书中将它作为褒义使用，并简单归纳为这样一种概念：理想主义是一种向上和进取的人生观，一种对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一种对真理不断追求、并愿意为之奉献的精神。这一界定也许不严谨，权且作为本书论述的前提。理想主义、责任感曾经是这代人非常强烈的群体意识，它不仅建筑在共产主义理想之上，还有一个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基础。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兼采道、法、释家的学说为补的文化体系。它包括心灵结构、价值体系和风俗习惯等多层次的内容，通过思维定式的理想追求等形式积淀为中华民族的国民性。自

“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大地迅为传播。但它不是以一种广义的文化形态，而主要以一种政治学说的面貌被接受，它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到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每个角落。即便在向人民宣传了大半个世纪的马列主义后，今天中国的国民心理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恐怕还是传统的文化心理。

传统文化中居首的儒家思想是一种“入世”的思想，它所关心的是现实的政治与人生，重伦理、重名份、重人情、重今世。其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冯友兰先生曾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他将这境界分为四个等级：顺着自己的本能生活，谓自然境界；有意识地为自己求功利而生活，谓功利境界；一个人只为社会利益生活，“正其义不谋其利”，谓道德境界；意识到自己是宇宙的天民，自觉地去天人合一，谓天地境界。不难看出，以儒学为主的传统人生观，凝聚着浓郁的使命感。

封建社会中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崇尚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被人们视为“完人”而被历世景仰的诸葛亮，其《诫外甥》即从修身立世的角度，强调人必须要有济世的品格，建立理想主义的追求。从孔夫子周游列国到康有为公车上书，这种传统从未中断，它与道家的无为出世相比，始终处于主流。牧羊北海的苏武、投笔从戎的班超、精忠报国的岳飞、冒死上疏的海瑞等，无不^是这种传统的写照。

古代诗歌中那些激荡人心的传世佳句，更能说明理想主义的精髓。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谦的“为得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近代中华民族的忧患和危难，更唤起志士仁人的责任感，如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秋瑾的“无限伤心家国恨，长歌慷慨莫徘徊”；梁启超的“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等等。最富有代表性的就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它以短短八个字，概括了绵亘几千年、激荡人们心灵的人格理想。

儒家思想不仅影响着世代知识分子，在广大农民的心灵中也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呼应。那些爆发于动荡年代的农民起义，那些散见于史册记载的檄言揭帖，也往往带有一种使命感的色彩。如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基本纲领“均平主义”和“均贫富”的口号，除了有宣传农民的政